

## 流存东瀛的唐寅诗书《送彦九郎》

陈小法

明代江南才子唐寅(1470-1523)诗文作品东传邻邦日本的不少,仅京都国立博物馆就藏有四件<sup>①</sup>,其中之一就是诗书《送彦九郎》。

唐寅的诗书作品《送彦九郎诗》(见图)是日本政府确定的“重要文化财”,相当于我国的国家二级文物。根据京都国立博物馆公布的资料,作品墨迹,纸本,纵84.4厘米,横42.0厘米<sup>②</sup>。1974年7月13日至8月11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大阪城天守阁举办的“中国和日本——文化交流二千年”展览会上,该作品作为中日友好交流的重要见证之一被特别展出。

由于该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占据的重要地位,自昭和三十一年(1956)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书道全集》第十七卷收录之后,中日书法界出版的其他大型工具书也多予以收录,《中国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和《中国书法鉴赏大辞



唐寅《送彦九郎诗》(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①四件作品分别为《春江鲙鱼图》、《秋景山水图》、《江山骤雨图》和《送彦九郎诗》,详见:  
<http://www.kyohaku.go.jp/jp/syuzou/index.html>

②刘正成在其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22页)中提到该作品的大小为82.4 cm×42.0 cm,恐有误。

典》等书更予以了较高评价和较为详尽的介绍<sup>①</sup>。但这些介绍大多仅从书法艺术角度着眼,至于该诗书内容、成立背景、涉及人物以及东传过程几乎不提。而在研究唐寅的主要专著中<sup>②</sup>,据管见所及,仅周道振、张月尊辑校的《唐伯虎全集》收录了《送彦九郎诗》的全文。本文不揣浅陋,拟对该作品作一考查,以求抛砖之用。

## 一、彦九郎与中日勘合贸易

诗书钱别的对象日本使臣彦九郎,“不知何许人,从名字来看不像是僧人,也可能是日本的海商”<sup>③</sup>。有学者进一步推测他是日本大阪堺市一带的贸易商人。

诗书序文“重直彦九郎还日本,作诗钱之,座间走笔,甚不工也”中的“重直”两字偏小,居右上角。关于此词之意,目前主要有两种推测,一是彦九郎之姓;另一种意见认为“直”通“值”,即“重值”,乃“再次会遇”之意。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此词是日本人姓氏之可能,但从钱别诗的全文分析,后者似乎更有说服力。至于序文的主要意思,张哲俊认为:“明代的文章对日本的字画,多给予了肯定。但也有评价不高的,如唐伯虎的《手书赠日本友人》。”<sup>④</sup>即张哲俊认为文中的“座间走笔甚不工也”是唐伯虎对彦九郎书法评价不高之语,原因可能是彦九郎不是僧人。但笔者认为,这句话应该是唐伯虎对自己作品的自谦,而不是对彦九郎书法的评价。

唐寅生活的年代,正值中日关系平和期。所谓平和期,即以勘合贸易为中心内容的明代中日关系,自建文朝酝酿,到永乐时恢复,再经过宣德时的修订而确立,之后从正统到正德朝,即沿着这一轨迹运行着<sup>⑤</sup>。尽管因一味追求政治效益的明王朝实施薄来厚往的对日交往政策,致使勘合贸易演变成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之后的明朝统治者,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调整。另一方面日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加之对勘合管理的混乱,酿成朝贡使臣之间的争斗。不仅如此,日本来华使臣不受约束,沿途骚扰滋事,频频为害地方。当弘治九年

①周倜主编:《中国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1472页;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第922页。

②主要有:《六如居士全集》,广益书局出版,民国七年;《唐伯虎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许旭光选注《唐伯虎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长城出版社编《唐伯虎书画全集》,长城出版社,2002年;陈伉、曹惠民编注《唐伯虎诗文书画全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

③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④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第288页。

⑤张德信:《浅析明代的倭寇与海防建设——兼论明代中日关系的走向》,日本京都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東アジア海洋域圏の史的研究》(京都女子大学研究丛刊39),京都女子大学,2003年9月。

(1496)八月礼部再次奏称日本使臣在济宁州持刀杀人时,明孝宗命“今后日本国进贡使臣,止许起送五十人来京,馀存留浙江馆,毅者严为防禁。”<sup>①</sup>只许五十名日本使臣上京这一命令一直延续至最后一次勘合贸易。因此,重直彦九郎应是五十名使臣中的一员。

明正德三年(1508)正值日本室町时代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的百年忌辰,为了筹措这一大型佛事所需之巨额经费,京都临济宗相国寺早在十年之前的日本明应七年(1498)就建议幕府向明朝派遣勘合贸易船只。京都相国寺是由足利义满于日本永德二年(1382)建成的一所名寺,位居京都五山之第二,其开山为东瀛赫赫有名的高僧春屋妙葩(1311-1388)。因此,由其发出筹款倡议应是最为得体的。

但是,此时的勘合贸易船只派遣权已经旁落于权臣大内氏和细川氏。最后,经过争议和权衡,大内氏领有一号和三号船,而二号船归属细川氏。其中遣明正使由大内氏推荐的东福寺僧了庵桂悟(1425-1514)出任,届时将携弘治勘合三道赴明。但是细川氏并不满足,私自增派船只一艘,由出生宁波鄞县的明人宋素卿担任纲司,携弘治勘合第四号单独入明。

据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记载,以八十七岁高龄了庵桂悟为正使的船队一行六百六十八人<sup>②</sup>在日本永正三年(明正德元年,1506)十月声势浩大地扬帆出发,到达宁波已是五年后的永正八年(明正德六年)。而细川氏单独派出的船只却早在1509年(正德四年)就登陆了。《武宗实录》卷五八“正德四年十二月戊子朔”载:“礼部奏,日本国进贡方物,例三船,今止一船。所赏银币,宜节为三之一。且无表文,止咨本部赐敕与否,请上裁得旨。”显而易见,这就是上述细川氏增派的船只。而明朝的礼部官员却不了解其中缘由,以为这次日本来贡船只只有一艘,所以主张所赏银币宜为往年的三分之一。而《武宗实录》卷八四“正德七年二月丙子朔”载:“日本国王源义澄遣使贡马匹、盔、铠、大刀诸方物。”这批才是了庵桂悟率领的使者团。

上面提到随了庵桂悟入明的有六百六十八人之多,但能进京的只有五十人,其余留在宁波待命。日本使者离甬赴京是在正德六年(1511)九月,十月末或十一月初抵达苏州。时姚江的杨端夫在饯别正使了庵禅师的诗文中提到:“日本了庵禅师,膺使命来我皇明,馆于姑苏几半载,凡士大夫之相与者,无不敬且重焉。”落款为“正德七年四月望日”<sup>③</sup>。当然,滞留姑苏半载的原因主要是山东、直隶一带因农民起义而局势十分混乱。

当日本使者完成朝贡任务由南京返回宁波,并于正德七年闰五月中旬再次经过姑苏时,彦九郎与唐寅之间发生了比较密切的交往。

①《孝宗实录》卷一一六“弘治九年八月乙亥朔”条。

②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民国二十八年据旧钞本影印,第9页。

③伊藤松辑,王宝平、郭万平等编:《邻交徵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唐寅在五年前建起了桃花庵别业<sup>①</sup>。在桃花庵里,他潜心钻研书画艺术,因积蓄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并具有高超的描绘客观事物的能力及熟练的表达主观思想情感的技巧,此时的唐寅已是画名鹊起、享誉四方。因此,唐寅之名应为日本使者所知。在当时,中国文人为日本使臣作诗赠别、题写序跋的屡见不鲜。如唐寅的好友、同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曾作有《和日本僧省佐咏其国中源氏园中白樱花》和《答日本使姓橘名省佐,相同寺僧》。诗中提到的即与祝允明进行诗文唱和的日本僧省佐(又名橘省佐、号钝牛),也是在和彦九郎差不多的时间里来明朝贡<sup>②</sup>,不过彦九郎是受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细川高国所遣。从能与祝允明进行交流这一点判断,橘省佐也是上京五十人中的一位,因此,与彦九郎相识的可能性很大的。或许可以这么说,日本使臣在苏州停留时,与当地文人的交流相当频繁。

## 二、作品的内容

各家在引录此诗时文字小有出入。因解读上图的书法作品,并不是难事,笔者迳自录文如下:“萍踪两度到中华,归国凭将涉历夸。剑佩丁年朝帝扆,星辰午夜拂仙槎。骊歌送别三年客,鲸海遄征万里家。此行倘有重来便,烦折琅玕一朵花。正德七年壬申仲夏望日,姑苏唐寅书。”下面对其文意及可能涉及的史实作一说明。

首联“萍踪两度到中华,归国凭将涉历夸”说明重直彦九郎有两次入明经历。那么,前一次又是在什么时候呢?据文献记载,相距最近一次的日本使节团在弘治八年(1495),正使为尧夫寿奠。彦九郎是否也在此次入明行列中,因无证据难以确凿。根据其他类似人物来看,连续入明的事例很多,因此也不能排除彦九郎上次入明可能就在弘治八年。

然而就在这次以尧夫寿奠为正使的日本使者回国时,宁波人宋素卿也随尧夫寿奠一行东渡到了日本。至于宋素卿东渡的原因,史书一般记为抵债,这也为大多学者所认可。但本人在研读中日两国史料的基础上,认为其东渡原因不是抵债,而为蓄意潜入<sup>③</sup>。据史书记载,携宋素卿东渡的日本人为“汤四五郎”,而对“汤四五郎”,学界也几乎一无所知,仅推测其可能亦为堺市商人。

东渡的宋素卿在十多年之后却作为堺市商人代表细川氏的使节出使明朝,可见,宋素卿与堺市商人之间有着不一般的关系。《明史》载:“(正德)五年春,其王源义澄遣使臣宋素卿来贡,时刘瑾窃柄,纳其黄金千两,赐飞鱼服,前所未有也。……至是,充正使,至苏州,澄与相见。后事觉,法当死,刘瑾庇之,

<sup>①</sup>卢寿荣:《唐寅画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08页。

<sup>②</sup>“(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内义兴复请勘合,遣省佐入贡。”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2000年,第65页。

<sup>③</sup>有关考证详见拙文《明代“潜入日本”的宁波人宋素卿杂考》,《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1期。

谓澄已自首,并获免。”<sup>①</sup>可见,在彦九郎与唐寅的交流地姑苏,宋素卿亦应逗留了不短的时间。而且笔者认为,彦九郎此次入明,极有可能与宋素卿同船,即于前面提到的正德四年(1509)入明,并一起进出姑苏。在姑苏,彦九郎结识了唐寅并有交往。

颈联“骊歌送别三年客,鲸海遄征万里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三年客”,即彦九郎在中国逗留的时间长达三年。唐寅题此诗的时间是正德七年(1512)仲夏,因此,彦九郎应该在正德四年入明。上文已经提到,正德四年十二月礼部上奏,称“日本国进贡方物,例三船,今止一船。”那么,这艘先至的就是彦九郎所乘的船只。这也可以佐证上述笔者的推断,即彦九郎此次极有可能与宋素卿同船入明。

有关彦九郎与唐寅的交往,还有一个故事值得一提。旅日华人作家陈舜臣小说《汉古印缘起》(中公文库,1989年)中有一篇名为“苏州唐寅的《日本早春图》”。内容大致说的是,彦九郎归国时带回了唐寅画的《日本早春图》,后来几经辗转,此画被日本的樱狮子酒厂老板收藏。没想到老板的儿子樱井卓治因缺钱,把几件收藏品悄悄地偷出请“我”保管,并将其中一件换了钱。数日后,一位男子自称是管理樱狮子收藏品的河村来到了“我”家,向“我”说明了情况。于是感到内疚的“我”如数将保管的书画交还给了他。可是,最珍贵的《日本早春图》不见了,河村痛心疾首地说,被樱井卓治卖掉的肯定就是它了。

史存各种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唐寅有《日本早春图》<sup>②</sup>这一作品,因此这是一个虚构的情节,可小说作者基于唐寅与彦九郎之间曾有交情这一史实虚构了这个故事,使读者觉得合情合理。一个是名不经传的日本使节,而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书画大家,仅通过一幅《赠彦九郎诗》而连在了一起,至今被人所念。虽然已经难以追寻当时的交流细节,但我们可以通过凝固的瞬间探索而得其大致过程。历史,尤其是友好的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力量和想象是无穷的。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①《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日本”。

②唐寅的画作中有一名《江南春图》(绢本手卷设色,31.5×146cm,广州市美术馆藏),上有唐寅自己的题画诗两首:“天涯腌溼碧云横,社日园林紫燕轻。桃叶参差谁问渡,杏花零落忆题名。月明犬吠村中夜,雨过莺啼叶满城。人不归来春又去,[与谁]连臂唱盈盈?红粉啼妆对镜台,春心一片转悠哉。若为坐看花飞尽,便是伤多酒莫推。无药可医莺舌老,有香难返蝶魂来。江南多少闲庭馆,依旧朱户锁绿苔。”(陈伉、曹惠民编注《唐伯虎诗文书画全集》,第64-65页)画上题诗第一首与《落花诗》之七同,第二首与《落花诗》之十七字句大异。第一首缺两字,据《落花诗》补。